



中华民族精神 研究

ZHONGHUA MINZU
JINGSHEN YANJIU

郑师渠◎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民族精神 研究

ZHONGHUA MINZU
JINGSHEN YANJIU

郑师渠◎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民族精神研究 / 郑师渠主编. —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303-09745-6

I. 中… II. 郑… III. 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研究
IV. C9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9529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邮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 mm × 230 mm
印 张: 33.5
字 数: 480 千字
印 数: 1~2 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6.00 元

策划编辑: 李雪洁 责任编辑: 唐正才 李雪洁
美术编辑: 高 霞 装帧设计: 高 霞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李 丽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导 言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为本民族绝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追求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审美情趣；是一个民族共同的心理、德性与特质的集中反映。民族精神既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个性与特质，它便成为了本民族赖以凝聚与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因之，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时代课题，它说：“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民族精神的概念，发端于18世纪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空前高涨的德意志，近代始传入中国。国人最初揭出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课题，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即甲午中日战争前后。其时，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因战后的民族危机及救亡图存的刺激，以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戊戌维新运动为载体，以新传入的西方社会进化论和民族主义为中介，最终实现了向现代意义的民族观念的转换。戊戌变法后，“民族建国”、“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呼声日高，这是中国现代民族观念形成最为鲜明的时代特征。也惟其如此，随着西学的传播和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课题的揭出，便成了合乎逻辑的必然。1903年《江苏》第7、8期连载佚名文章《民族精神论》，是国人第一次使用“民族精神”一词，但其自觉讨论民族精神的问题却是始于1899年梁启超发表的《中国魂安在乎》一文。梁启超在文中说：“日本人之恒言，有所谓日本魂者，有所谓武士道者，又曰日本魂者何，武士道是也。日本之所以能立国维新，果以是也。吾因之以求我所谓中国魂者，皇皇然大索之于四百余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伤哉！天下岂有无魂之国哉！吾为此惧。……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

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者，则兵之魂也。而将欲制造之，则不可无其药料与其机器。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药料也；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①在这里，所谓“中国魂”、“国魂”，就是指中国的民族精神；所谓“制造国魂”，就是强调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所以，其后佚名的《民族精神论》这样写道：“日人知有大和魂焉……彼其泣于斯、歌于斯、舞蹈于斯、崇拜馨香于斯者，其心目中恍若有神使鬼差、颠倒于其间者，故能游心大字，发为猛兽踔厉，发挥刚毅之气。呜呼，此何物耶？其即吾所谓精神云云者耶！”很显然，在作者看来，梁启超所强调的日人的所谓“大和魂”，就是指日本民族的民族精神。尽管梁启超说“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尚不免失之于狭；但他一针见血，强调“中国魂”的核心是“爱国心与自爱心”，却是十分深刻的。

进入20世纪后，“重铸国魂”说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在近代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关于“国魂”、“国性”、“国民性”、“立国精神”、“中国文化精神”等的讨论，无论怎样见智见仁，归根结底，无非都是在执著地呼吁和苦苦地求索如何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以期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为了实现全民抗战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此种呼吁和求索，更是达到了高潮。其时在各种报刊上，有关民族精神的文章随处可见，《东方杂志》等刊物还为此出版了专号。重庆的《民意周刊》甚至举办了“民族道德与民族精神”征文比赛，面向社会大众征文，并将获奖的文章最终结集出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既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同时，又成为了中华民族实现全民抗战、民族精神空前高扬的时期。抗战的胜利是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但是，有识之士以弘扬民族精神为职志，奔走呼号，大声疾呼，厥功甚伟。

新中国成立后，显然是受“左”的思潮影响，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的问题未曾得到应有的重视。党的十六大报告高度重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中起了极其重要的精神支撑的作用。

^① 梁启超：《中国魂安在乎》，《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38～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据1936年版影印。

这既是凝聚人心、集中力量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我们党对于文化问题，尤其是中华文化在综合国力中的核心与基础作用的认识进一步深化的必然结果。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研究，因之也正成为了我国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二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反抗西方列强的产物；但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①“中华”一词始于魏晋，由“中国”与“华夏”两个名称组合而成。“中华”与“中国”一样，都是地理名称，但是，在古代，“中华”同时又是文化与民族的称谓。在近代，“中华”又与传入的“民族”一词，组合成了“中华民族”，用作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各民族的总称。中华民族精神，就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②中华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其形成与独具特色，与后者一样，皆源于中华民族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即“实际的生活过程”。就其最初缘起而言，荦荦大者，有三：地理环境、民族融合与农业经济。

（一）地理环境

任何民族的生殖繁衍都有赖于一定的生存空间，这就是地理环境。我国位于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临太平洋，北有广漠，南有横断山脉。四周的自然屏障，使中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地理单元。同时，我国地形西高

^①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3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东低，西部有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东部却是广大的平原和丘陵地带。有人把这种地形比作一把巨大的躺椅，背对欧亚大陆腹地，面朝辽阔的太平洋。由于受到地形和季风的影响，境内东部湿润多雨，西部干旱，北部严寒，南部炎热，这又形成了完整而复杂的内部结构。此种地理环境，对于中华文化及其中华民族精神的缘起，影响至深：

首先，在远古条件下，它决定了中华民族及其中华民族精神起源的独创性，决定了它们在很长的时间里只能走独立发展的道路。新中国的考古证明，在我国人类进化自直立人（猿人）经早期智人（古人），至晚期智人（新人）各进化阶段的人体化石，可以建立较完整的进化序列。已发现的古人类遗存地点达 300 多处，遍布全国各地。早在 170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国的史前文化就已经形成了华北和华南两大文化谱系，其中包括著名的元谋文化、周口店文化、蓝田文化、许家窑文化、丁村文化等在内，说明在远古时代，中华大地上就已普遍有了人类的生存繁衍。中国史前文化谱系的分布及其趋同发展和最终导入古代文明的过程，层次分明，脉络清晰。在这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中国境内各文化谱系有过相互间的联系与影响，但因地理阻隔，与南亚、西亚、中亚和地中海这样一些史前文化发达的区域和古代文明中心，却难以发生联系。中国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始于汉代，但当时的中华文化已臻昌盛，中华民族精神早已形成了。这与罗马文化主要吸收希腊文化成长起来，印度古文化主要仰仗外来民族的创造，是大不相同的。

其次，由于地形多样，气候不同，辽阔的中华大地，不仅在新石器时代即形成了稻作农业经济区、旱地农业经济区和狩猎采集经济区三大史前文化区并存互补，从而为多种经济和多民族的发展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酿就了中国史前文化多元性统一发展的态势。在新石器晚期的三大经济文化区下，我国史前的文化发展还形成了六个小的文化区——中原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山东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文化区，它们彼此互相影响，相互激荡。其中，中原文化区居六个文化区的核心。因地理条件的优越，它更容易吸收周围文化区的养分，所以发展水平最高，后来成为我国第一个王朝夏的诞生地，最早跨入了文明社会。这样我国史前文化就形成了一种分层次的向心结构，即文明首先发生在中原地区，其次是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最后是第三层即最外层的各文化区。考古学家把这种文化结构

形象地称作“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中原文化区是花蕊，其他文化区是花瓣。这种独特的结构，对后来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中国史前文化已经形成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很自然地就发展为以华夏族为主体、同周围众多民族或部落保持不同程度关系的文化与政治格局。这就奠定了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并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凝聚力。^①这在钱穆先生，则称之为中国文化的“大局面”。他说：“埃及和巴比伦的地形，是单一性的一个水系与单一性的一个平原，印度地形较复杂，但其最早发展，亦只在印度北部的印度河流域与恒河流域，它的地形仍是比较单纯，只有中国文化开始便在一个复杂而广大的地面上展开。有复杂的大水系，到处有堪作农耕凭藉的灌溉区域，诸区域相互间都可隔离独立，使在这一个区域里面的居民，一面密集到理想适合的浓度，再一面又得四周的天然屏障而满足其安全要求。如此则极适合于古代社会文化之蕴酿与成长。但一到其小区域内的文化发展到相当限度，又可藉著水系进到大水系而相互间有亲密频繁的接触。因此中国文化开始便易走进一个大局面，与埃及巴比伦印度，始终限制在小面积里的情形大大不同。”^②中华文化的此种“大局面”，同时也影响了中华民族精神中，追求“和而不同”、可大可久特质的形成，是不难想见的。

（二）民族融合

早在新石器时期，在我国黄河中下游已形成了东西两大氏族部落集团。传说在距今约 5000 年左右，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联合，于涿鹿大败九黎，杀其首领蚩尤。随后，黄帝部落复与炎帝部落大战于阪泉，黄帝获大胜，成为了黄河中下游大部落联盟的首领。这一传说正反映了黄河中下游东西两大氏族部落集团长期交往、融合，并最终通过征战结成部落联盟的历史过程。以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为主干，东西两大氏族部落、四周的一些部落，逐渐融合成了汉族的前身——华夏族体。经夏商周的发展，西周时华夏族体粗具规模。秦统一六国，正是在这个民族共同体渐趋稳定的基础上完成的。华夏是

^① 以上参考了严文明先生的文章：《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载《北京大学学报》，1984（4）。

^② 钱穆：《中国文化导论》，4～5 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多源汇聚的结果。有学者指出：“华夏是蛮夷戎狄异化又同化的先进产物。”“由此，可以说，中国是蛮夷戎狄共同缔造的。”^①秦汉时，在华夏族的基础上，各民族的进一步融合，形成了汉族。费孝通先生强调说：汉族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继续不断地吸收其他各民族的成分的同时，也不断给其他民族输入新的血液。从生物基础，或所谓“血统”上讲，“可以说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在发生混合、交杂的作用，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以说是‘纯种’”。但是，汉民族的形成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成为了中华民族赖以形成的一个凝聚核心：“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②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归根结底，是以中华民族为载体。所以，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既是以华夏—汉族为主体，渐次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与之相应，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便也呈现出了以汉民族文化为中坚、同时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的特点。

（三）农业经济

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的中心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形成了南北各具特点的农业，大致以秦岭—淮河为界，北方是以粟、黍为代表的旱地农业为主，南方则是以水稻为代表的水田农业为主。距今约8000年，粟在磁山、裴李岗遗址中已有遗存。距今约7000年，在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稻。距今约7000—4600年的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长江流域的马家窑文化等，已经显示出此期农业有了相当的发展，较大型的定居村落已四处可见。进入距今约4600年的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出现了铜器，尤其到距今约2800年出现了铁制农具和战国后期铁制农具的普遍推广，农业也因之更加发展。黄河流域因地理气候的优越，农业最为发达，所以这一地区成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大中心。汉族主要从事农业，它所以能在历史上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新鲜血液，像雪球一样越滚动滚大，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农业经济的独具魅力。费孝通先生说：“如果要找一个汉族凝聚力的来源，我认为汉族的农业经济是一个主要因素。看来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

① 张正明：《先秦民族结构、民族关系和民族思想》，载《民族研究》，1983（5）。

②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10、23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农业社会里，迟早就会服服帖帖地主动融入汉族之中。”发达的农业不仅为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经济基础，在费孝通先生看来，它同时还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网络基础。他指出，由于汉族善于经营农业，凡适于耕作之地，无所不往，故“汉族通过屯垦和通商各非汉族地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的网络，把东亚这一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并取得大一统的格局”^①。

而早在公元前四五千年便已形成的南北两大农业体系，更对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生生不已、得以源远流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著名的考古学家严文明在《农业起源与中华文明》中写道：“这两个农业体系的形成对中国来讲极为重要。为什么？这两个农业体系在两个地方，但两者又紧挨着。北方旱地农业歉收了，南方的水地农业可以作补充；南方水地农业歉收了，北方旱地农业可以作补充。而且这个农业体系涵盖的地方非常大，……比伊拉克要大好多倍，比埃及也大好多倍，比古印度那块地方也大好多倍。这两个大而互补的地方，会起一种什么作用？因为大，它就有一个宽广的基础，而中国周围都还是采集狩猎经济，没有强势文化。即使有一个比较强势的文化来干扰，它这个核心地区也是稳稳当当的。西方就不是这样了，尽管有的地方发展程度很高，但它比较脆弱，有一个野蛮民族入侵，一下子就把它消灭了。所以不管是像伊拉克两河流域的文化也好，古埃及文化、古印度文化也好，都中断了。现在的埃及人不是古埃及人的后裔，现在的印度人也不是古印度人的后裔，两河流域也一样。只有中国这个地方没有中断过。这是中国文明的一大特点。中国文化的特色，就以这个广大的农业为基础，而且是两个农业体系，就像双子座似的，拧在一起。”^② 农业经济的上述功能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自然要发生深远的影响，但这些影响毕竟还是间接的；其更为直接的影响，还在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的小农经济的自身特点，诸如农业生产对土地、水源、气候等自然资源的依赖；适于小家庭经营与自给自足；农作物生产周期长，周而复始……如此等等，潜移默化，使中华民族浸成了注重人与自然间的和谐、重实际轻玄想，以及重家族

①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34～35页。

② 《光明日报》，2009-01-08。

伦理、安土乐天、中庸观念、人生经验与祖先崇拜，等等的精神特质。汉儒公孙弘说：“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① 中华民族精神追求“和”，显而易见，这里所描绘的“和之至”，是一幅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农业丰收、人畜兴旺的景象，就反映了这一点。

上述地理环境、民族融合与农业经济，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缘起的物质基础，但究其形成，当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华民族精神的初步形成，大致是在先秦秦汉之际，春秋战国尤其是重要的形成阶段。对此，我们固然无法提出准确和量化的指标，但却可以指出其中最重要和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场景。

其一，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实体已初步形成。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与核心，它的孕育形成，既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表征。汉族作为族名固然不能早于汉代，但作为多源汇聚的民族实体，却必然早于汉代，大约育成于春秋战国时期。^② 不仅如此，华夏—汉族虽是多源汇聚的结果，夏、商、周三族始祖与祖先崇拜，也传统各异，但其时却已认同黄帝是共同的始祖，这显然是民族认同的结果。惟其如此，“战国七雄，各自统一一方，都是多民族诸侯国。所以秦统一已具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性质”^③。先秦秦汉时期，中华民族既已初具规模，与之相应，中华民族精神也告形成，是合乎逻辑的。

其二，春秋战国、秦汉之际，正是雅斯贝斯所讲的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期文明的重要特点，就是思想界巨人辈出，提出了许多影响至今的理想与重要的范畴，从而构成了人类精神的觉醒。春秋战国 500 年里，各地的人口流动，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各国的称雄争霸，将中华文化推向了第一次高峰，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和突破。其时，儒家、墨家、道家、名家、法家等诸子纷起，百家争鸣，正是中华民族人类精神觉醒具体而生动的反映。尤其孔子提出“仁”的学说，强调“仁者爱人”，更成为“人类精神觉醒的一个

① 《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卷 58。

② 汉族作为族名，一说始于魏晋南北朝初期。费孝通先生以为春秋战国是汉族作为民族实体的育成期。参见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9~10 页。

③ 阴法鲁，许树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1），28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明显的标志，也就是中国古代轴心期文明正式开始的一个重要标志”^①。从此，天的权威动摇，神的光环隐退，人的精神高扬。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所谓人类精神的觉醒，就是本民族精神的觉醒。梁启超认为，学术是思想的根核，“学术进步”是实现“全国民精神”“统一”的思想源泉。这里所谓“统一”，不是指排斥异端，而是指民族精神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共同的心理、思想倾向。所以，“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②。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学说，实已提出了构成中华民族精神核心范畴的一些重要思想，诸如“和为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庸”等，深刻影响了后人的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成为了此后数千年中华民族精神繁荣发展、生生不已的学术思想渊源和活水源头。以孔子为代表，诸子百家学说的涌现，可视为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重要表征。^③所以，梁启超说：“春秋战国之交，是我们民族大混合、大醇化时代，是我们社会大蜕变，大变革时代。”“在这种时代之下，自然应该是民族的活精神尽情发露，自然应该有光怪陆离的学术思想……”^④他正是将民族大融合、时代大变动、学术思想大勃兴的春秋战国，视为中华民族精神“尽情发露”的重要时期。

其三，继春秋战国之后，出现秦汉昌盛的时代，是历史的必然产物。秦统一中国，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承秦制，同时以董仲舒为代表，复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理论，确立了“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路线，使先秦以来追求“大一统”的时代趋势，在政治、经济、文化相统一的基础上，不仅变得更加自觉，而且有了体制性的依托。汉代国势强盛，文化方向明确，因之雄视阔步，极大地激发了开放与进取的民族精神。从张

① 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462页，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

②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

③ 柳诒徵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参见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231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此言有失绝对化，文化传承、发展不可能仅系于一人一身。但他强调孔子在先秦中国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对于我们理解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显然是有借鉴意义的。

④ 梁启超：《译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57页。

蹇“凿通西域”到丝绸之路的开辟,从佛教的引入到道教的形成、中外交通与儒、释、道的互补,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滋荣发舒,开拓了新的境界。

要言之,民族的大融合、诸子百家学术的发凡起例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大一统格局的渐次出现,使先秦秦汉之际,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最终形成并继往开来最重要的历史时期。

中华民族精神博大精深,人们对它的体认,因时代的不同与个人取角的差异,不免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梁启超是最早试图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作出概括的代表性人物,他以为,其内涵主要有四:道中庸,重和谐;重统一与团结;重德;重爱国。^①在抗日战争时期,王鲁季概括有五:大同主义、民本主义、德治主义、和平主义、中庸主义。^②吴坤淦则以为是:勇武、博大、勤奋、坚忍。^③当今学者的见解,同样莫衷一是。例如,张岱年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方立天则以为是:重德、务实、自强、宽容、爱国,^④如此等等。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一概括,无疑是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中华民族精神所作的迄今最为精辟的概括,同时,它也构成了今天我们理解和研究中华民族精神重要的思想指导。但是,与此同时,它并不影响人们从学术层面对中华民族精神进一步作多角度的探讨。事实上,胡锦涛总书记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问题,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概括,其侧重点都各有不同。例如,2005年9月3日,他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讲话,强调指出:伟大的抗日战争进一步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并表现出了许多鲜明的特点,“这就是: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

① 郑师渠:《梁启超的中华民族精神论》,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7(1)。

② 《论中华民族之精神》,见郑师渠,史革新主编:《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研究读本》,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③ 《民族道德与民族精神》,见郑师渠,史革新主编:《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研究读本》。

④ 俞祖华,赵慧峰:《中华民族精神新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侵略者的民族自强信念，开拓创新、善于在危难中开辟发展新路的民族创造精神，坚持正义、自觉为人类和平进步事业贡献力量的民族奉献精神。”^① 2006年4月21日，他在耶鲁大学演讲，则将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概括为：“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注重自强不息，不断革故鼎新”；“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注重亲仁善邻，讲求和睦相处。”^② 2006年10月22日，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讲话，又将“长征精神”概括为：“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并强调，“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③

根据我们体会，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还可以作以下概括：

（一）“和”的精神

追求和谐，重视“和”或称“和合”、“中和”的思想，^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特质。《中庸》云：“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肯定了“和”为最高准则。因之，孔子有言：“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⑤和即为美，它是儒家追求的最高理想。庄子也说：“与人者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⑥和即是乐，它同样是道家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和”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范畴和最高的准则，深刻影响了人们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① 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5-09-03。

② 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光明日报》，2006-04-23。

③ 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光明日报》，2006-10-23。

④ 张岱年先生说：“‘和合’一词起源很早。用两个字表示，称为‘和合’；用一个字表示，则称为‘和’。”参见张岱年：《漫谈和合》，载《中华文化论坛》，1997（3）。

⑤ 《论语·学而》。

⑥ 《庄子·天道》。

成书于商周之际的《周易》，被公认是中国思想的源头。剥去其巫术的外衣，可以看出它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试图给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历史发展作出总体性的说明，建立起宇宙的模式。《周易》用八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分别代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以此去包罗世界万物。八卦的自相重叠又产生六十四卦，再以此去说明纷纭复杂的自然现象及其相互关系。而卦又是以阴爻与阳爻互相重叠而成的。这样，《周易》就从宇宙万物中抽象出了阴阳两个概念，强调阴阳的相辅相成是万物生成变化的前提。阴阳平衡是自然界及人类社会获得和谐发展的根本条件；反之，阴阳失和必然招致祸乱。《周易》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父子、君臣，以至于构成整个的人类社会。^①这里包含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它看来，包括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在内的整个宇宙，是一个生生不已的和谐的生命统一体；宇宙万物内部都存在着对立的双方，二者必须贯通、联结、和合、平衡，万物才能顺利发展。所谓“阴阳合德”、“刚柔相济”，都是强调对立面的统一、和谐。这种对立面的和谐又不是在静态中实现的，而是表现为不断的运动、变化和更新的过程。所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日月相推而明生焉”，都强调了和谐就是矛盾双方互相转换的结果。《周易》说：“乾道变化，各正生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②“天道”的变化，有一定的规则，它通过阴阳和合，终令万物在变化的过程中，各正其位，各得其所。宇宙也因此是一个处于不断运动、变化着的和谐的生命统一体。“和”是宇宙的核心精神，“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③。“和”是阴阳交感的本质，也就是宇宙间的“善”。

此种“和”的宇宙观影响后世。《老子》第42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中庸》也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值得重视的是，与《周易》成书时间相仿的我国医学，也同样是根据阴阳交感和合的原理建立起自己独特的医学理论。《黄帝内经》说：“阴阳者，

① 《周易·序卦传》。

② 《周易·彖传·彖上·乾》。

③ 《周易·系辞上》。

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显然，从宏观到微观，都说明古人形成了“和”的宇宙观。

宇宙观决定人生观。宇宙既是一个生生不已的和谐的生命统一体，实现个人生命与宇宙生命的融合，以体验宇宙间最高的“善”、“乐”、“美”，自然成为古人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了。孔子的“仁”，以和为贵，实已超越了天人的界限，所以有“如天之仁”的说法。孔子晚年自信自己不仅“知天命”，而且无处不“耳顺”，即随心所欲，也不会因有所出格而造成内心的遗憾。他显然是认为自己实现了与自然界高度和谐与统一的崇高精神境界。孟子也讲“万物皆备于我”“乐莫大焉”^①。所谓“万物皆备于我”，也是指个体与自然界融为一体。孟子认为他自己也达到了此种境界，体会到了其中莫大的快乐。至于庄子认为与人和得“人乐”，与天和得“天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②，主张清静无为、物我两忘，更是带上了追求精神绝对自由的浪漫了。以儒家、道家为代表，古人心目中人生的终极理想，都不在于与肉体同朽的功名利禄，而在于超越物我，在求与自然合一中实现精神的不朽。所以，人们常常用“与日月同辉”、“和天地并存”一类词，赞美贤者的道德文章，也是强调他超越了物欲，达到了精神与宇宙自然界和谐并存的崇高境界。

当然，不仅是宇宙观、人生观，戏剧小说追求大团圆的结局、江南庭院营造“咫尺天涯”、中国画强调“气韵生动”的意境^③，等等，所表现的审美观，以及中国历史上流传至今的许多格言，诸如“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政通人和”、“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等等，也都说明了中华民族精神追求和谐的特质，实渗透到了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和”的精神培育了中华民族主张宽容的博大胸怀。孔子讲“仁者爱人”，

① 《孟子·尽心上》。

② 《庄子·齐物论》。

③ 王国维说：中国戏剧不同于西方，追求大团圆的结局，“若《牡丹亭》之追魂，《长生殿》之重圆，其最著之一例也。”“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阅者之心，难矣。”（《〈红楼梦〉评论》，见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1卷，10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孟子进一步提出“亲亲、仁民、爱物”^①，惠施则讲“泛爱万物，天地一体”^②。从主张“爱人”，进而主张“爱物”，终至扩充到主张天地一体，“泛爱万物”，无疑显示了中华民族博大的胸怀。实则，《周易》有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强调君子应具有大地般宽广深厚的胸襟，去包容天地万物，就已对中华民族此种包容精神作了经典的概括。中华民族的包容精神，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主张“天人之际，合而为一”^③，“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④，即强调人类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朋友，天人一体，人类应与自然界友好和谐相处；表现在对外关系上，是主张“协和万邦”^⑤，即强调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各国和睦相处；表现在思想文化问题上，是主张兼容并包，相反相成，“有容乃大”。《周易》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⑥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庸》也强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庄子·杂篇·天下》最早提出“百家”一词，说：“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教派冲突；相反，“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海纳百川，诸家争鸣，尤其是迎受印度佛教，融合中外文化，形成儒、释、道互补，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表现在知人论世上，则是强调“君子不为己甚”、“执两用中”、“过犹不及”、“中立不倚”、“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等等，以中庸思想为核心，形成了富有辩证思维的处世哲学。

（二）重 德

早在西周之初，周公总结商朝败亡的教训，就已提出了重德的思想：“明德慎罚。”^⑦《周易》讲：“君子以厚德载物。”^⑧其后，孔子提出“仁”的学

① 《孟子·尽心上》。

② 《庄子·天下》。

③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④ 张载：《正蒙·乾称篇》。

⑤ 《尚书·尧典》。

⑥ 《周易·系辞下》。

⑦ 《尚书·康诰》。

⑧ 《周易·上经坤》。